

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农牧环境的变迁

——兼论北魏为何定都平城

孙靖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汉末以来,桑干河(湟水)流域内的经济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桑干河南,在不同时期保留或恢复了不同程度的农耕经济,北魏时期迁徙畿内的农耕居民多安置于此地;而在其北部,自汉末以来就完全畜牧和狩猎化,北魏时期更是迁徙了大批游牧、渔猎民族于此,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苑囿,更适合作为牧民和猎手的“国人”居住。所以在北魏时期,形成了“湟北地瘠”的经济格局。在代北地区的众多城市中,平城位于阴山以北拓跋鲜卑故地进入桑干河流域的三条主要胫道中居中之者,地处湟北的国人聚居区,便于沟通草原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区域,控制整个桑干河流域乃至华北地区,所以自猗卢时代即开始经营,最终定都于此。

关键词: 北魏;桑干河;农牧环境;平城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320(2012)03-0022-11

关于北魏定都平城的原因,历来的说法多从形胜着眼,却未能解释为何代北之地诸多城邑,包括马邑、善无、高柳、代王城等名城,都拥有北控沙漠,南临晋冀的战略位置,而最终北魏却选择了两汉时期的普通县邑——平城这一事实。本文认为,拓跋鲜卑最终选择平城为首都,是当时代北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格局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为后人所忽视的原因,就是自汉末以来桑干河流域经济格局的变迁。

一、南北有别——东汉末年桑干河流域城镇体系瓦解的历史过程

东汉末年,发生了遍及全国的战乱,边塞地区的匈奴、鲜卑、乌桓等游牧民族乘时而起,导致汉族居民大量流亡,代北地区原本阡陌遍布、村庐城郭相望的景象不复存在,正像《元和郡县图志》所记载的:

后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尽云

中、雁门之间遂空,曹公立新兴郡以安集之,理九原,即今州是也。^[1]《卷14《忻州》P400)

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曹公鸠集荒散,又立平城县,属新兴郡。晋又改属雁门。^[1]《卷14《云州》P409)

这两条记录大同小异,其主旨都是为说明北部边郡的荒残,可以想见,随着汉人居民的流散,农耕经济也必然衰落。但与云中、定襄相比,桑干河流域的雁门、代郡情况却略有不同。这要从新兴郡的设立背景谈起。《晋书·地理志》并州条提到:

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后又分上党立乐平郡。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2]《卷14 P428) ①

这段文字说明了新兴郡的设立是为了安置定襄、云中、五原、朔方和上郡这五郡的南逃居民。但同属边郡,而且就在勾注陉北的雁门郡和代郡却未

收稿日期:2012-02-10

作者简介:孙靖国(1977—),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①按:此处“省入冀州”,前田正名理解为“撤销郡的建制,并入冀州”(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这实在是错误的理解,郡本身比州级别要低,并入某州并不需要撤销郡的建制。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为魏公,继续任丞相,领冀州牧。把并州各郡并入冀州,是为了扩大曹操的直辖范围。此五郡虽属并州,但其建制取消,与并州并入冀州是两回事。

被记录在五郡之列。

关于这五郡的去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如下记载:

(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3] 卷1, P45)}

这则史料记载了当时安置五郡流民的措施,对每个郡的流民设置一个县进行管理。当时的情况已经没有任何史料进行佐证,《晋书·地理志》中并州新兴郡下列九原、定襄、云中、广牧和晋昌五县。九原是五原郡的治所,云中既是郡名也是云中郡治所,定襄郡的治所本在善无,此处应该是以郡命名(因东汉定襄县属云中郡管辖),广牧本为朔方郡一县,很明显看出是为安置流民所设,而且中间透露出移民来源的信息。晋昌则找不到头绪,从其名字来看,应该是西晋所取,但此县何时设立,是否为安置难民所设,以及是否与安置上郡难民有关都无法确认。

但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新兴郡的设立的确是为了安置五郡,至少是定襄、云中、五原和朔方四郡难民。那么,同样位于并州陜北地区的雁门郡和代郡情况如何呢?《元和郡县图志》记录了雁门郡的两个县——平城和马邑的安置情况:

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曹公鸠集荒散,又立平城县,属新兴郡。晋又改属雁门,晋乱,刘琨表封猗卢为代王,都平城。后魏道武帝又于此建都,东至上谷军都关,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门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为甸服。^{[1] 卷14, P409)}

汉末大乱,(雁门)郡遂荒废,建安中曹公又立马邑县,属新兴郡。晋改属雁门郡。晋乱,其地为猗卢所据,刘琨表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1] 卷14, P407)}

可见,平城和马邑两个县都在新兴郡重建,其模式应该也是按照上面所述五郡进行。但之所以没有将雁门列在新兴郡所安置各郡之列,是因为雁门郡还存在。

《太平寰宇记》记载:“魏文帝移雁门郡南度句注,置广武城,即今州西故城是也,晋如之。”^{[4] 卷49《河东道十》, P1025)}两汉雁门郡实际上跨句注陜南北,在陜南尚有宁武、鹵城和原平三县,既然雁门郡置于广武,可见原郡治阴馆县已经废弃,《晋书·地理志》所谓“自陜岭以北并弃之”在汉末时期是如实描述。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据《三国志·牵招传》记载:

大军欲征吴,召(牵)招还,至,值军罢,拜右中郎将,出为雁门太守……招自出,率将归泥等讨比能于云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鲜卑附头等十余万家,缮治陜北故上馆城,置屯戍以镇内外……郡所治广武,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太和二年,护乌丸校尉田豫出塞,为轲比能所围于故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宪禁招,招以为节将见围,不可拘于吏议,自表辄行,又并驰布羽檄,称陈形势,云当西北掩取虏家,然后东行,会诛虏身。檄到,豫军踊跃。又遣一通于虏蹊要,虏即恐怖,种类离散。军到故平城,便皆溃走。比能复大合骑来,到故平州塞北。招潜行扑讨,大斩首级……招与刺史毕轨议曰:“胡虏迁徙无常,若劳师远追,则迟速不相及。若欲潜袭,则山溪艰险,资粮转运,难以密办。可使守新兴、雁门二牙门,出屯陜北,外以镇抚,内令兵田,储蓄资粮。秋冬马肥,州郡兵合,乘衅征讨,计必全克。”^{[3] 卷26, P731-733) ①}

如上所述,牵招任雁门太守是在文帝发动大军要征讨孙吴,寻又放弃之时,按发兵伐吴是在黄初三年(222)冬十月,罢兵是在四年春正月^{[3] 卷2《文帝纪》, P82)}。那么牵招任雁门太守就应该是在黄初四年,这样他召集河西鲜卑附头等十余万家修缮陜北的故上馆城也应该在此后不久。上馆城也就是阴馆城,这次缮治故上馆城的举动,表明了曹魏政权着手恢复对陜北山地前缘地带的统治。

从上文所用的“云中故郡”、“故马邑城”、“故平城”等字眼,再与前面提到的在新兴郡安集五郡流民,并于陜南设置马邑和平城二县的叙述相对照,可以坐实五郡以及雁门郡的陜北部分确已放弃。

同时,从牵招“使守新兴、雁门二牙门,出屯陜北”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出曹魏政权对于恢复陜北地区的控制的打算。事实上,曹魏的经营最终超过了牵招缮治故上馆城的原计划。《晋书·地理志》记载雁门郡辖广武、崞、陶、平城、蓁人、繁峙、原平、马邑八县^{[2] 卷14, P429)}。其中广武、蓁人、原平三县本在陜南,此处的平城应该是在新兴郡重设的县,并非几百里之外的“故平城”。马邑曾徙于陜南的新兴郡,西晋时还属雁门郡,而汉马

①按:此处“平州塞”应为“武州塞”或“平城塞”之讹。

邑本身就在陜北不远,既然中原政权着手经营陜北,县治应还置原址才是。而关于繁峙和崞县,《魏书·序纪》记载:穆皇帝三年(西晋永嘉四年,310)“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刘)琨求勾注陜北之地。琨自以托付,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陜南,更立城邑”^[5]《卷1》P7)。可见此五县本在陜北。《魏书·地形志》中二县属于恒州繁峙管辖,更是提供了可靠的佐证。这样我们可以推测,文中所谓的“又置”,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在汉县原址重建。陶在东汉也属陜北,所以应该也与两县情况相同。也就是说,魏晋两代在陜北不远处除修缮了东汉雁门郡治阴馆城外,还恢复了马邑、崞、陶和繁峙四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县都处于桑干河以南,可以说,在雁门郡,魏晋政权凭借桑干河建立了陜北的防线。

代郡的情况没有雁门郡这么清楚,但我们还可以寻到一点蛛丝马迹。东汉光武帝诱使乌桓入塞,分布在沿边诸郡,其中就包括代郡:

建武二十五年(49),乌丸大人郝旦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3]《卷30《乌丸传》裴注引王沈《魏书》P833)

东汉末年,由于局势混乱,乌桓趁势而起,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击败蹋顿统辖的辽西、辽东属国和右北平三郡乌桓联盟后,代郡乌桓成为幽州地区最强大的乌桓势力。在曹操征讨代郡乌桓之前,任裴潜为代郡太守。《三国志·裴潜传》记载了他在代郡的事迹:

时代郡大乱,以潜为代郡太守。乌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称单于,专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潜精兵以镇讨之。潜辞曰:“代郡户口殷众,士马控弦动有万数。单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将兵往,必惧而拒境,少将则不见惮。宜以计谋图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单车之郡。单于惊喜。潜抚之以静。单于以下脱帽稽颡,悉还前后所略妇女、器械、财物。潜案诛郡中大吏与单于为表里者郝温、郭端等十余人,北边大震,百姓归心。^[3]《卷23《裴潜传》P672)

代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乌桓手中,三单于手握上万军队,联结官吏,实力是很强的。三年以后,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218),裴潜调职返邺,几十天后,代郡乌桓起兵反汉,“夏四月,代

郡、上谷、乌丸、无臣氏等叛,遣鄱陵侯彰讨破之”^[3]《卷1《武帝纪》P51)。《三国志·任城王彰传》详细记载了此事: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以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数千骑卒至。时兵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骑数百匹。用田豫计,固守要隙,虏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至于桑干,去代二百余里。长史诸将皆以为新涉远,士马疲顿,又受节度,不得过代,不可深进,违令轻敌。彰曰:“率师而行,唯利所在,何节度乎?胡走未远,追之必破。从令纵敌,非良将也。”遂上马,令军中:“后出者斩。”一日一夜与虏相及,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3]《卷19《任城王彰传》P555-556)

此处提到“桑干”,按《续汉书·郡国志》,东汉代郡辖桑干县,《晋书·地理志》中无。但此处未有“县”、“城”等字样,所以无法确定其为该县,而在《水经注》中,桑干水与湟水可“互受通称”,故此处“桑干”也可能指湟水,也就是今天的桑干河^[6]《P21-26》。曹彰率军追到桑干,就被认为是“涉远”,而且出发前的方略是“不得过代”,过代即为“深进”,可见代郡的北部已经是乌桓的控制区域了。

按《晋书·地理志》,代郡辖代、广昌、平舒和当城四县,上谷郡辖沮阳和居庸两县,太康年间从上谷郡分出的广宁郡则辖下洛、潘和涿鹿三县。这九县中,沮阳和居庸两县位于桑干河南流河道以东且不论,其余七县,除下洛外,全部位于桑干河以南,而下洛县虽属桑干河北岸,也处于洋河汇入桑干河的三角地带。联系到雁门郡的情况,我们可以认识到,曹魏和西晋时期,逐步恢复并巩固了对桑干河以南地区的控制,并依托桑干河建立了防线。

在桑干河以南地区,既是为魏晋政权控制,农耕经济和城市都应保持并继续发展,而非单纯的军事区域。如代国时代的雁门郡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货累巨万。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爱其才气,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署,求含于琨……含乃入代,参国官。后琨徙五县之民于陜南,含家独留……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称莫含壁”^[5]《卷23 P603-604》。可见灏南陜北五县的汉族居民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

《魏书·序纪》提到,穆皇帝三年:

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

(刘)琨求勾注陁北之地。琨自以托付,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陁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5] [卷1 P7]}

此处“更立城邑”四字,是沿“徙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五县之民于陁南”一句文意而来,应该是在陁南之地为安置五县的居民而建立城邑,因为这五县本是汉县,原本就有城,不必再“更立”。前田正名认为是“在五县土地上建造城邑,然后一并献给了穆皇帝”^{[7] [P49]},应该是对文意的误解。既然这五县之民的迁徙需要特别记载,应该具有一定的数量,而且还要建筑城邑来安置,移民主体应该是农耕居民。可见在魏晋期间,桑干河以南地区保持着农耕经济和城市生活,桑干河成为代北地区的农牧业分界线。

二、北魏前期代北地区农牧业环境——以治所城市的建设为切入点

刘琨徙五县民于陁南之后,桑干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已经畜牧和狩猎化。淝水之战后,前秦势力大衰,构成前秦帝国民族马赛克的各支力量纷纷趁势而起。利用这一时机,原被前秦控制的拓跋鲜卑也谋划复国。登国元年(386)春正月,拓跋珪大会各部于牛川,即代王位,随即,拓跋珪改称魏王,定国号为“魏”。

登国二年,北魏联合后燕,攻灭独孤部刘显势力,控制了大同盆地。皇始元年(396),“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其部落。宝上谷太守慕容普邻捐郡奔走”^{[5] [卷2 P27]}。至此,桑干河流域全境为北魏所据有。天兴元年(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5] [卷2 P33]}。所谓“正封畿,制郊甸”,即《魏书·食货志》所记载的:“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5] [卷110 P2850]}《元和郡县图志》云州条则记为:“后魏道武帝又于此建都,东至上谷军都关,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门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为甸服。孝文帝改为司州牧,置代尹。”^{[1] [卷14 P409]}所谓“甸服”,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

服。”^{[8] [卷1《周语上》P4]}也就是说,“甸服”应该就是“京畿”、“京邑”之意。《魏书·地形志》记载:

恒州,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5] [卷106 P2497]}

东燕州,太和中分恒州东部置燕州。^{[5] [卷106 P2493]}

(肆州)雁门郡,秦置,光武建武十五年罢,二十七年复。天兴中属司州,太和十八年(494)属(肆州)。^{[5] [卷106 P2475]}

又王仲萃推测,朔州之设置,是在太武帝时^{[9] [P1070]}。那么,在燕州和朔州分置之前,其管理的地区都应该由临近的司州管辖,所以《元和志》中的范围,应是燕、朔两州未析置,雁门郡未改属之前的司州范围,而《魏书·食货志》中的范围,则是以北魏迁洛改司州为恒州之后的恒州范围为断,应属追溯之语。那么,究竟哪一个范围才是北魏的“畿内”地区呢?

道武帝设立京畿之地的同时,还据有今天山西和河北之地,对于这些地区,尤其是河北平原,他综合采用武装镇压、迁徙豪强和宗主督护三种措施进行控制,关于这一政策,李凭作了很精辟的分析^{[10] [P388-393]}。也就是说,对于中原地区,北魏并非进行直接统治;相对应的,道武帝规定了北魏的直接控制地区,也就是“畿内”。就在制定畿内的天兴元年,道武帝“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此六州,据母有江研究,包括冀、安、幽、徐(黎阳)、并、雍(武乡、上党、建兴三郡)^{[11] [P26-27]},即今桑干河流域东部的燕州并不在迁徙范围内,再参以都代时期,北魏君主多次巡幸上谷、濡源的事实,我们可以认为上谷、广宁二郡地区也在“畿内”范围内。至于汉代的云中、定襄地区,本来就是拓跋鲜卑的故地,自然也属于北魏直接控制地区。

以今大同盆地,也就是“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的地域为核心,以今宣化盆地、河套平原和雁门郡所在的忻定盆地为外围,北魏确立了稳定的根据地,以此作为进取中原、征服四方的基地,并开始由游牧、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艰难历程。在从道武帝时期到孝文帝迁都洛阳的96年间,桑干河流域的经济得以恢复,人口得以增加,城镇也逐渐建设起来。《魏书·地形志》记载了六镇之乱后东魏重建的侨置恒、燕等州的行政区划,但既然是侨置,当有所本。以此为线索,综合参考《水经注》与《魏书》等相关史籍,我们可以复原出27座北魏时期曾设置为治所城市或加以利用的城邑(限于文章篇幅,本文

未将每个治所城市的具体考证纳入其中),下面将对这 27 座城邑的设置年代和地理分布进行分析,以求得北魏时期桑干河流域城市分布的时空特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桑干河流域的经济分布格局。

(一) 城邑设置的时间顺序

北魏建立对桑干河流域的统治之后,在桑干河流域东部,继承了后燕的郡县体系;而西部的大同盆地则由于郡县体系在西晋末年崩溃,所以以重建为主。

《南齐书·魏虏传》言:“什翼珪始都平城,犹

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12] (卷57, P984)} ①如萧齐的信息可靠的话,那么道武帝时期的雁北地区除平城外,其他郡县城邑都尚未加以修筑。从太武帝到文成帝,北魏主要是沿用汉晋旧城。从比较晚的记载来看,这些旧城大多都已设县,所以可以推测这些县都是在这—时期设置的。而从文成帝到孝文帝时期,桑干河流域的城邑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其特点是一批新的城邑设治。太平县、平齐郡城、永固县等都是这一时期设立的,见表 1。

表 1 北魏桑干河流域城邑建治时间表

城邑	设治年代	公元	备注
代	皇始元年	396	
平舒	皇始元年	396	
广宁	皇始元年	396	
潘	皇始元年	396	
涿鹿	皇始元年	396	
大宁	皇始元年	396	
小宁	皇始元年	396	
大宁郡城	皇始元年	396	太和中置郡
繁峙	天兴元年	398	太和中置郡
平城	天兴元年—二年	398—399	
马邑	神瑞元年之前	414	
平原郡城	始光三—四年	426—427	
崞山	太平真君元年	440	
太平	皇兴三年	469	
平齐郡城	皇兴三年之后	469	
怀宁	皇兴三年之后	469	
归安	皇兴三年之后	469	
永固	太和十四年	490	
武周	不详		两汉旧县
善无	不详		北魏初即利用
昌平	不详		
昌平郡城	不详		太和中置郡
桑干	不详		太和七年之后置郡
高柳	不详		北魏初即利用
鼓城	不详		
安阳	不详		北魏初即利用
阴馆	未设县		

(二) 城邑的地理分布

根据上文的复原,我们可以看到,北魏时期的桑干河流域,形成两个比较明显的城邑分布区,一个是沿桑干河的带状区域,分布着马邑、平齐郡城、阴馆、桑干、繁峙、安阳、昌平(故城)、昌平郡城、平原郡城、潘县、广宁、涿鹿、沮阳等 13 个城

邑,若平齐郡的怀宁和归安两县都确有其城的话,也都应该在这—地带。另一个则是平城附近地区,以平城为中心,分布着武周、永固和鼓城 3 个县城。

若以桑干河为界,我们可以发现,今桑干河以南地区分布着马邑、平齐郡城、阴馆、桑干、繁峙、

①按:道武帝时期对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即“天赐三年(406)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平城宫,阙门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

崞山、平舒、代、安阳、昌平(故城)、昌平郡城、平原郡城、潘县、涿鹿等14个城邑,若包括怀宁和归安的话,则共有十六个城邑。而桑干河以北地区,则分布着善无、武周、太平、平城、永固、鼓城、高柳、大宁、小宁、大宁郡城等10个城邑(广宁郡城紧挨桑干河,故南北都不计在内),这10个城邑都地处北塞边缘,军事意味更加浓厚。而且从设置时间来看,永固、鼓城、太平都是平城时代后期才增设的。可见,在平城时代大部分时期,桑干河以南地带的城邑数量和密度都远远超过桑干河以北地区。

三、“灋北地瘠”——北魏时期农牧经济的地域差异

拓跋鲜卑对桑干河流域非常重视,自代国时期便开始多加经营。究其缘故,除占据桑干河流域便于向南向东发展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桑干河流域处于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宜畜牧业,又适宜农耕。从沙漠汗开始,拓跋部不断涌现出倾心中原先进农耕文明的杰出领袖。什翼犍便曾计划定都于灋源川,被王皇后阻止。据《水经·灋水注》,灋水出雁门阴馆县累头山,“东北流出山,迳阴馆县故城西”^{[13][卷13 P1126]},则灋源川当即陞北阴馆县一带。而在此之前,什翼犍即位就是在灋水以南的繁峙之北^{[5][卷1 P12]}。天兴元年(398),道武帝拓跋珪甚至短期定都于繁峙。在繁峙,道武帝进行了四件对北魏国计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更选屯卫、计口受田、祠天西郊和定国号为魏。根据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的研究,我们知道,“离散诸部”、“息众课农”是道武帝即位后的既定国策,其用意即在于打散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北魏统治范围的各民族、部落民众的血缘纽带,将迁徙不定的原部落民转变为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即《魏书·外戚传》中表述的“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5][卷83 P1812]}。这次“计口受田”的对象是“内徙新民”,也就是“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这36万人既包括汉人,也包括丁零、鲜卑、高丽等诸多北方和东北民族,他们大多很久以前就已经入居内地,习惯农耕生产方式。所以才会分给他们耕牛,“计口受田”。从这次“计口受田”是在繁峙这一传统农耕经济地区进行来看,这些“内徙新民”很可能最初安置在繁峙等灋南地区。

从什翼犍到拓跋珪,他们先后在桑干河以南地区经营,其定都的目的地开始都放在这一地带,除了便于向陞岭以南的并州和太行山以东的河北

地区发展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以桑干河为界,桑干河流域的农业经济条件和基础存在较大的差别。

道武帝年间,大臣和跋曾比较过桑干河南北的土地条件:

初,将刑(和)跋,太祖命其诸弟毗等视决。跋谓毗曰:“灋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各相勉励,务自纂修。”令之背己曰:“汝曹何忍视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诈称使者,云奔长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诛其家。^{[5][卷28 P682]}

和跋此言,当然是另有所指,但既然当着监视的人对话,就不可能信口胡说,否则必定引人生疑。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眼中,桑干河以北地区,农业条件应该是不如其南的。太和十四年(490),高闾针对畿内饥荒提出建议“明察畿甸之民,饥甚者,出灵丘、下馆之粟以救其乏。”^{[5][卷54 P1206]}可见直到此时,桑干河以南的农业仍超过灋北地区,有余粮可供赈济。

另一个例子是平齐郡的转徙。平齐郡初设的地点是北新城,位置在“平城西北”。而立郡不久便迁徙,其目的地则在“京城西南二百余里旧阴馆之西”^{[5][卷24 P630]},《水经·灋水注》记载灋水“东北流出山,迳阴馆县故城西。县故楼烦乡也,汉景帝后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魏皇兴三年,齐平,徙其民于县,立平齐郡”^{[13][卷13 P1127]},可为一证。这次迁徙的青、齐二州民,自然是熟悉农耕生产和生活,比如《魏书·崔光传》就记载其事迹“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5][卷67 P1487]}平齐郡立郡不久便迁徙到灋南的今夏关城西一带,其动机应该还是因为“灋北地瘠”,寻求更好的农耕条件。

四、何以“灋北地瘠”?——北魏时期桑干河流域农耕、畜牧和渔猎经济的盈缩

一般来说,在中国内陆半干旱区域,纬度的差异的确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但就整个桑干河流域而言,整体的水热条件相差不远,除朔州市朔城区等少数地区外,桑干河两岸的河谷谷地年平均气温相差不到1℃,桑干河北的一些地区,降水量和光照甚至超过河南地区,总体来看,桑干河南北的地理环境并不足以造成农业发展程度的重要差异,这一现象,还要从北魏时期的总体经营策略和经济形态来寻求原因。

道武帝创立北魏之初,除大规模的征战外,最重要的措施是离散诸部,“这一措施对于拓跋氏

的统治机器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转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0] (P37)}。据李凭研究,道武帝离散诸部前后共有三次,其中以天兴元年(398)在繁峙实施的一次规模最大,意义最深远。《魏书·太祖纪》记载该事如下:

(正月)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 36 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车驾次于恒山之阳。……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峙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5] 卷2, P31-32)}

本文前面讨论过,刘琨徙陞北五县民,猗卢徙民十万户之后,除今宣化盆地桑干河以南的地区以外,桑干河流域已经基本成为游牧地区。天兴元年,北魏迁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 36 万到大同盆地,配给耕牛,计口受田,重新将农耕经济导入这一地区。

但是,北魏由一个游牧部落联盟转化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过程是痛苦而艰难的,拓跋

氏皇族摆脱部落时代的推举制度、兄终弟及和母后干政传统,就花了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的近百年时光。相应的,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各部各族由原来的游牧和狩猎生活生产方式过渡到定居农耕,也必然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过程。同样,桑干河流域也经历了一个由畜牧、狩猎和农耕经济杂处逐渐过渡到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相当漫长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是桑干河流域的景观由牛羊被野、麋鹿成群到阡陌纵横、城郭相望的转变经历。

(一) 北魏前期桑干河流域畜牧经济的发展和分布

拓跋鲜卑迁入大漠以后,便以游牧为业,而归附于拓跋部,共同构成部落联盟的各部族,也同样多是以游牧生活为主。在道武帝建立北魏之初,曾进行多次战争,迁徙了北方各部族的众多人口,俘获了大批牛羊等战利品,现主要根据《魏书》列表于下(见表 2):

表 2 北魏平城时代虏获人畜情况表

君主	俘获时间	战争敌方	俘获数量	材料出处
道武帝	登国三年(388)六月	库莫奚	杂畜十余万	太祖纪
	登国三年(388)十二月	解如部	男女、杂畜十数万	太祖纪
	登国五年(390)三月	高车袁纥部	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	太祖纪
	登国六年(391)十一月	匈奴铁弗部	牛羊二十余万	太祖纪
	登国六年(391)十二月	匈奴铁弗部	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太祖纪
	天兴二年(399)二月	高车杂种	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	太祖纪
	天兴二年(399)二月	高车遗进七部	获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	太祖纪
	天兴二年(399)二月	侯莫陈部	获马牛羊十余万头	太祖纪
	天兴五年(402)正月	黠弗、素古延等诸部	马三千余匹,牛羊七万余头	太祖纪
	天兴五年(402)正月	蠕蠕	铠马二千余匹	太祖纪
	天兴五年(402)二月	匈奴铁弗部	马四万余匹,骆驼、牦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	太祖纪
	天兴五年(402)二月	没弈干	马四万余匹,杂畜九万余口	资治通鉴 ^{[14] 卷112, P3536)}
	太祖时	高车	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	高车传
	永兴四年(412)七月	越勤倍泥部落	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	太宗纪
明元帝	始光元年(424)七月	蠕蠕别帅	马万余匹	世祖纪
	始光四年(427)六月	夏	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	世祖纪
	神䴥二年(429)六月	蠕蠕	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	蠕蠕传
太武帝	世祖时	高车	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	高车传
文成帝	和平元年(460)九月	什寅	畜二十余万	高宗纪
	和平五年(464)	蠕蠕	戎马器械不可称计	蠕蠕传

这些俘获的牲畜,相当一部分会迁徙到云中盛乐一带的牧场中去,但相信会有很大比例的牲

畜转移到桑干河流域,以满足习惯于肉食、奶酪饮食的北魏贵族和“国人”的生活需要。比如《魏

书·太宗纪》记载,永兴五年(413):

秋七月己巳,还幸薄山。帝登观太祖游幸刻石颂德之处,乃于其旁起石坛而荐飧焉。赐从者大酺于山下。奚斤等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徙二万余家于大宁,计口受田。^{[5][卷3 P53]}

这些部落的财产,全都是马、牛等牲畜。

另外,北魏时期,有大批游牧民族被迁入以大同盆地为核心的桑干河流域。据前田正名研究,天兴元年从河北、山东迁徙约46万人,世祖时期从各地迁徙约50万人。4世纪末到5世纪中叶,这里成了“显著的人口密集的区域”,“可以推测大约有100万人左右”;到5世纪后半期,由于向关外流出和饥饿死亡,平城人口减少了一半^{[10][P85-86]}。而李凭则推测,仅道武帝时期迁入雁北的人口即有150万,拓跋部落联盟迁入者约为80万^{[10][P364]}。很难想象这些游牧民被迁到桑干河流域,“计口受田”就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转变成农民,过上农耕生活。

可以想见,这些原游牧民迁徙到桑干河流域,所谓“分土定居”,恐怕未必就是从事农业,最多就是由原来的游牧转变为定牧而已。畜牧业是北魏前期的重要产业,贵族的财产往往会用牲畜来计算,比如道武帝时,王建因战功受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5][卷30 P709]},就能说明问题。统治者在考虑经济问题时,也会首先想到畜牧业,比如明元帝泰常六年(421),“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5][卷110 P2850]}。又比如太武帝时,在讨论应该先讨伐赫连夏还是柔然时,长孙嵩建议:“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5][卷25 P644]}太武帝本人更是以牧民自居,曾当众说:“国人本着羊皮袴,何用绵帛?”^{[14][卷125 P3948]}平城地区发生大饥荒,在讨论是否迁都邺城时,崔浩建议“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5][卷35 P808]},认为不必立即迁都。可见奶制品是桑干河流域居民的重要食品。

(二)北魏前期桑干河流域狩猎经济的发展与分布

拓跋鲜卑原本就是一个狩猎民族,《魏书·序纪》追溯其祖先事迹时说:“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5][卷1 P1]}

狩猎本身就是游牧经济的一种重要补充。北魏定都平城以后,狩猎经济与活动依然活跃。据黎虎研究,“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是拓跋鲜卑传

统生产生活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它除了具有军事的、游乐的目的之外,还具有经济的意义,仍然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15][P164]}。下面将北魏定都平城后君主在桑干河流域范围内狩猎活动的记录按时代顺序列表比较(见表3)。

通过表3的比较,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北魏平城时代,君主总体说来是热衷于狩猎的,而且很明显,前期狩猎活动要超过后期。从地域上来看,其狩猎活动遍及大同盆地各地,可见足资猎取的动物遍布灏水南北,但位于灏南的狩猎活动远少于灏北。

北魏平城时代狩猎经济相当繁荣,从道武帝定都平城以来,就在大同盆地划分苑囿,蓄养禽兽,以资狩猎。《魏书·高车传》记载:

于是高车大惧,诸部震骇。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为围,骑徒遮列,周七百有余里,聚杂兽于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5][卷103 P2308]}

鹿苑范围之广大,杂兽之众多,都是惊人的。到明元帝时,又进行了扩建,泰常六年(421),“发京师六千余人筑苑,起自旧苑,东苞白登,周回四十余里”^{[16][卷1《魏本纪·太宗纪》P33]①}。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找出导致“灏北地瘠”的原因。在北魏建立之初,由于以拓跋部为中心的各游牧部落进入桑干河流域,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畜牧业和狩猎业在该地区成为重要生产方式之一。道武帝时期实行的“离散诸部”、“息众课农”政策,更主要的是为打散原来部落的血缘联系,成为北魏国家统治下的编户齐民。从道武帝到太武帝,由于战乱频仍,需要原草原骑射劲旅的战斗力,没有必要,也没有余暇改变原游牧民的生活方式,改从农耕。所以,虽然从天兴元年(398)开始,北魏朝廷就迁徙数十万农业居民进入京畿,但农耕经济发展一直十分缓慢。直到孝文帝时期,力行汉化,弛山泽之禁,农耕经济才获得比较宽松的发展空间^{[15][P161-164]}。

从地域空间的角度来看,桑干河以北地区接近内蒙古草原,且地域开阔,草木丰茂,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建设了庞大的苑囿体系,严重挤占了农耕经济的空间。而在桑干河以南,由于汉末西晋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农耕经济,繁峙、马邑、阴馆等地的农耕经济基础较好,在北魏时期成为安置农

①按《魏书》卷3《太宗纪》作“周回三十余里”。因今本《魏书》多补自《北史》,故从前者。

表 3 北魏平城时代君主于桑干河流域狩猎情况表

君主	出猎时间	材料表述	狩猎地点位置
道武帝	天兴六年(404)七月	筑离京于豺山 纵士校猎	灏北
	天赐三年(406)正月	幸豺山宫 校猎 至屋孤山	灏北
		田于白登山	灏北
明元帝	永兴三年(411)	猎于西山	灏北
	永兴四年(412)	登虎圈射虎	灏北
	永兴四年(412)七月	大狝于石会山	灏北
	永兴四年(412)七月	田于善无川	灏北
	泰常二年(417)十二月	田于西山	灏北
	泰常五年(420)	幸东南鵽鹵池射鸟	灏北
	泰常七年(422)九月	田于东苑	灏北
	泰常八年(423)三月	出游于白登山东北……命左右射鵽	灏北
		猎于灏南(此事似在明元帝即位前)	灏南
太武帝	神䴥三年(430)八月	行幸南宫 猎于南山	灏南
		幸豺山校猎	灏北
		田于崞山	灏南
文成帝	太安三年(457)正月	畋于崞山	灏南
	和平三年(462)二月	畋于崞山	灏南
	和平四年(463)四月	幸西苑 亲射虎三头	灏北
		苑内游猎	灏北
		又猎 亲欲射虎	灏北
献文帝	皇兴二年(468)二月	田于西山	灏北
	皇兴二年(468)五月	田于崞山	灏南
	皇兴三年(469)四月	田于崞山	灏南
		猎方山	灏北
孝文帝		无	

耕人群的主要地区。最终导致桑干河成为重要的地理界限。汉末西晋时期是游牧地区与农牧交错地带的分界线;北魏时期是农业生产水准的分界线,故而导致了“灏北地瘠”局面的产生。

五、关于北魏定都平城的几点蠡测

作为山西省第二大城市与北部中心城市,沟通山西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交通枢纽,以及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大同无疑是中国的重要城市之一。由于史料的限制,大同建城史的肇端——平城的设置与筑城年代并无确切记载。汉高祖六年(前201)春正月,“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17]《卷1《高帝纪》, P61》。此时的三郡大部还在匈奴手中。直至次年,樊噲止定代地,汉对今天大同盆地和蔚县盆地的控制才稳定下来。既然西汉自汉高祖七年才占领此地,那么所封的53县应该都是秦县。而平城之名最早见于史著,就是在高祖六年的白登之围,可见平城应属于这53个秦县之列。考虑到原本据有雁北地区的赵国同样实行郡县制,那么平城很有可能在战国时期就已设县筑城。

但这一时期的平城县,只是雁门郡所辖的东

部都尉治所^[17]《卷28《地理志》, P1621》,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改变这座城市命运,最终使其成为辽、金二代的西京、明清两朝的边境重镇的关键性事件,是北魏定都平城,使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

那么,当拓跋部族进入代北地区,将其作为“畿内之田”经营的时候,面临着两汉雁门、代郡几十个郡县故城,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平城?从战略意义和城市基础来看,马邑城是西汉初年韩国的首都,周边土地相对肥沃,其财富曾引起匈奴单于垂涎,是汉武帝“马邑之谋”的诱饵。代郡城今称代王城,是战国时期代戎的首都,西汉代国也曾建都于此,其地临近飞狐道,是沟通大同盆地与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善无城先后为两汉雁门郡与定襄郡的治所,规模宏大。高柳城曾为两汉之际军阀卢芳盘踞之地、东汉代郡的治所,从表4所列这五座城市考古所见规模来看,很难想象平城会最终脱颖而出。

笔者认为,拓跋部建都平城,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沟通蒙古草原与农牧交错地带的需要
拓跋鲜卑源自大兴安岭地区,经过漫长的迁

表4 城址规模比较表(单位:米)

城址名称	汉城	属郡	级别	周长	出处
蔚县代王城	代县	代郡	郡治	9265	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
右玉县右卫镇城址	善无	雁门	郡治	8000	《右玉县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
朔州城址	马邑	雁门	县城	7200	利用 Google Earth 测算。
阳高县李官屯城址	高柳	代郡	郡治	3300	方连宝:《高柳城址初探》,《文物世界》2005年第5期。
大同市城址	平城	雁门	县	3916	殷宪:《北魏平城考述》,《北朝研究》第七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徙,于汉魏之际到达阴山一带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匈奴之故地”。神元二十九年(248),拓跋部壮大到“控弦士马二十余万”^[18]〔卷101《皇王部二十六》, P481〕。

三十九年,拓跋部领袖力微迁居到汉定襄郡盛乐故城,举行祭天大会,诛杀观望不至的白部大人,建立起一个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容纳各部鲜卑、匈奴、丁零、柔然等民族的大部落联盟。

晋惠帝元康五年(295),拓跋部疆土分为三部,“帝(昭皇帝祿官)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统之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之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5]〔卷1 P5-6〕。总的来说,拓跋部沿明长城一线在内蒙古高原一带发展。虽然中间经历了猗卢索要湟南之地,获得了整个代北地区的事件,但拓跋珪建魏之后,拓跋部的根本之地,还是在盛乐一带,草原和游牧生活对于拓跋部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北魏定都平城之前,拓跋部曾有建都于湟南的尝试,第一次为什翼犍时期:“昭成(什翼犍)初欲定都于湟源川,筑城郭,起宫室。”^[5]〔卷13 P323〕第二次是在拓跋珪时期,他在繁峙宫即位,很可能当时就有定都于该地的打算,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平城。究其原因,还在于桑干河流域是一个过渡地带,这一过渡性不但体现在气候上的湿润向干旱地带过渡,还包括经济上的农业向畜牧业过渡。游牧民族经营此地,多选择内蒙古高原南缘一线的沟谷出口处,比如东汉初年依附匈奴的卢芳,其盘踞代郡时,就以高柳为巢穴^[19]〔卷12《卢芳传》, P507〕。据《水经·湟水注》,“雁门之水出于雁门之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其水东南流迳高柳县故城北”^[13]〔卷13 P1175-1176〕,雁门水为今洋河支流黑水河,溯其胫道可通今内蒙古兴和,便于匈奴接应。

而平城的位置与高柳类似,位于御河西岸,向北沿河谷就可到达今内蒙古丰镇,交通便利,便于与草原根据地沟通。

正因为此,早在穆皇帝猗卢六年(313),就“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5]〔卷1 P8〕,猗卢冬夏来往二都之间。这样,平城作为沟通拓跋故地与桑干河流域,背靠游牧区域根据地,俯瞰新得之地的区位优势就凸显出来。

(二) 拓拔部长期经营之地,具有历史传统优势

正因为平城是拓跋鲜卑进入、控制桑干河流域这一农牧交错地带,进而南窥陜南农耕区域的关键节点,所以在拓跋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其法统的重要一环。田余庆先生据《水经·湟水注》中“平城……西郊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建兴四年”的记载,推测其为西晋建兴四年,桓后祁氏立其子普根及普根之子,即在此郊天^[20]〔P252-253〕。祭天为拓跋鲜卑大事,通常会大会诸部。见诸史载的大会诸部,在建立北魏之前一共有四次,第一次为神元三十九年(258),力微在盛乐大会诸部;第二次为桓帝初年,“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5]〔卷13 P322〕;第三次为此;第四次就是登国元年(386)春正月,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5]〔卷2 P20〕。三次大会祭天,在代北的只有平城这一处,虽然祁后所立之君不属于北魏大宗,但毕竟是桓帝之后,还是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尊重,而尽管猗卢经营平城时间不长,之后就陷入长期的战乱纷争,但毕竟平城是拓跋鲜卑在桑干河流域的重要活动之地。这种历史地位在北魏定都平城的决策中,应该还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平城在拓跋内乱一直到道武帝建立北魏的这段时间

里,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利用,比如前秦建元十六年(380),苻坚就“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2](卷113《苻坚载记》,2903)。

(三) 位置居中

在雁北谷地的北部,沿内蒙古高原南缘,有三条主要陆道沟通内蒙古高原与大同盆地,汉代分别设置了三座重镇,自西向东为控扼中陵水(今沧头河)谷地——苍鹤陁的善无城(今右玉县右卫城)、控扼于延水(今御河)谷地的平城与控扼雁门水(今黑水河)谷地的高柳城,平城最终成为北魏首都,是因为其位置居中。

前面提过,北魏的畿甸地区,是广、狭二意的,也就是指前面所述及的“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的核心地区以及“其外四方四维”,也就是以今大同盆地为核心,以今宣化盆地、河套平原和雁门郡所在的忻定盆地外围。在这一地带中,在桑干河流域北缘一线,平城明显处于居中位置,这也是其成为首都的重要因素。

(四) 地处灏北畜牧狩猎经济文化核心区

拓跋珪确定畿甸区域的前后,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一个是以平城为首都,另一个就是大量迁徙各处居民进入代地,其中包括以拓跋部及其所

统辖的众多游牧部落随之迁入的,还有他们所驱赶的大量牲畜、野兽。由于桑干河以南还留有一定程度的农耕基础,迁徙而来的汉人、徒河等农耕人口安置于此;而桑干河以北地域开阔,水草丰茂,北魏以平城为中心,建设了广大的苑囿和牧场,以满足畜牧与狩猎人口的需要,形成了畜牧与狩猎经济区,这一区域的居住者大多为拓跋部的“国人”,他们聚居在平城周围,形成畿甸中的核心区。对于确保国人的战斗力,保卫皇室的安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以桑干河为界的经济区划,是北魏在灏北建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北魏选择背靠大漠、俯瞰中原的桑干河流域作为根据地,在桑干河流域内部,又选择背靠内蒙古高原南缘,地处畜牧与狩猎经济区内,位置居中,与草原故地有陆道可通的平城,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与区域内各重要城邑的比较,的确属于最优选择。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纵使民族、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迁,大同依然能够保持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这一区位优势显然是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5]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6] 孙靖国. 《水经注》“乱流”新解[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0(10).
- [7] [日]前田正名. 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 [8]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9] 王仲荦. 《北魏延昌地形志》北边州镇考证[A]. 王仲荦. 北周地理志[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0] 李凭. 北魏平城时代[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1] 毋有江. 北魏政区地理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5.
- [12]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13] 酈道元, 著. 杨守敬, 熊会贞, 疏. 水经注疏[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 [14] 司马光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5] 黎虎. 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A]. 魏晋南北朝史论[C].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
- [16]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8] 李昉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9]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20] 田余庆. 拓跋史探[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On the Changes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Environment in Sanggan River Valley in Middle Ancient Times

——Discussing the Reason Why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Makes Pingcheng Be Its Capital at the Same Time

SUN Jing-guo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Han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th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forms in the Sanggan River Valley. In the south, farming economy is maintained or recover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farmers immigrated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settled. While in the north, it has been the complet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since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the nomadic, fishing and hunting tribes settled. As a resul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infertile north Sanggan River is forme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mong the cities in Daibe region, Pingcheng lies in the north of Yinshan Mountain, the middle of the three roads for Xianbei tribe to enter Sanggan River Valle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the settlement of immigrated Xianbei tribe. Therefore, it is convenient to communicate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and to control the whole valley and even the whole north. Because of these, it begins to be built since Yilu and finally becomes the capital.

Key words: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anggan River; environ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Pingcheng

[责任编辑: 岳 岭]